

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

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研究

(申请博士学位)

专 业：世界地区史、国别史
方 向：日本近代思想史
导 师：吴廷璆教授

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

一九八八年六月

PDG

序 论

在我们举国一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必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在近代化过程中，中国为什么总是迟迟不前，以致于远远落后于邻国日本？这又和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有什么关系？生为炎黄子孙，有责任把上面的时代课题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为对其给以科学的回答做出贡献。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对解决上面的问题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研究，可以给中日文化比较，特别是近代前后的中日文化比较提供一个很好的线索和入手处。中日两国都地处东亚，同属于儒教文化圈，自古以来两国有过较多的文化交往，日本文化曾受过中国文化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近代化过程中也都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上，产生过近代启蒙思想。通过对两国启蒙思想的比较，可以给对它们形成启蒙的文化基础或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以极大帮助。

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兴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文化研究热潮。“文化热”的兴起，固然有种种原因，但是最主要的一个思想原因，则是人们出于近代化的紧迫感，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的重新反思。文化研究，由于视角的变化，引起了研究领域的扩大和方法的更新，促进了中国学术的繁荣和水平的提高。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认识，不可能脱离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即

从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由微观研究再到微观研究基础上的宏观研究。中国的文化研究，就总体而言，到目前为止，可以说仍处于研究的第一阶段，即宏观研究阶段（最多刚刚显示向第二阶段微观研究转化的苗头）。既然是宏观研究，研究者的着眼点和注意力往往抛开具体实证性的分析，而集中于对不同文化的特征进行定性描述。这样的描述虽然能使人对不同类型的文化有一个概括地了解和直观地把握，但往往论断失据，使我们的文化研究不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当今的文化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由单纯一般性、抽象性的研究，转入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一般抽象和比较，才能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得出较为符合实际的结论，也才能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所贡献。

实际上，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文化长河中，虽有始终一贯的东西存在，但又因流域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阶段。如中国先秦不同于两汉，两汉不同于宋明，清代不同于近代；日本中世不同于近世，近世不同于近代，等等。另外，作为某种文化类型或文化模式，它本身并不能作为某种独立的事物而存在，而是随人们的长期活动积淀于人们的衣、食、住、行和思想、艺术、宗教等活动中，而成为这些活动的形式，正是这种内在的形式，才使人类的某些共同活动如衣、食、住、行和思想、艺术、宗教等，在一些民族那里以那种方式表现出来，在另一些

民族那里又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但是，无论是一种文化模式，还是前面所提到过的某一民族的不同时期的文化形态，都必须依据对具体的文化现象（如衣、食、住、行、思想、艺术等）的分析，才能逐步接近。而思想史的研究，则是接近的方法之一。

由上可以推知，在思想这种普遍性相当高的文化产物的层面进行的比较，也是文化比较研究的一种类型。一般来讲，由于思想具有超越其产生的文化土壤而获得普遍性的性格，那末，拿各种不同国家的特定思想家的思想进行比较，并把其结论作为一般文化比较的结论，保险系数并不是太大的。这就需要在比较过程中，尽量选择那些对各自文化有典型意义的人，或者极其相似的同一类型的思想流派，然后仍要精心剔除属于普遍性的思想因素，在这之后的比较思想研究，才能进入产生思想差异的文化的特性问题。中日两国近代启蒙思想，都是产生于为了应付外来势力的挑战而奋起应战的近代化过程中。这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又是一场文化冲突。作为冲突主动者的西方占着优势，而东方则处于劣势。文化自我保存的机制，是在遇到异质文化挑战和威胁时，极大地调动自身的优势，击退或者缓解威胁，或者吸收对方的长处以自强，达到文化生存的目的。中日两国启蒙思想家生活的那个时代，是文化尖锐冲突的时代。他们的思想之所以能风靡一时、影响深远，就在于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课题。这使他们的思想印有鲜明的文化痕迹。再加上我们所比较的并不是某一位思想家，而是一个思想派别，所以，通过两国启蒙思想的异

同来进行文化比较，要相对可靠一些。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将把我们的比较文化研究的对象，扩大到与近代西欧文明的比较。在西欧中世纪末期，曾发生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早期市民启蒙思潮，到十七、十八、十九世纪，又爆发了波及整个西欧的启蒙思潮，它成为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思想先导。东亚的儒教文化圈的中国和日本，也都曾分别在明清之际和德川时代前期发生过文艺复兴、儒教改革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潮，但近代启蒙却始终没能由自身产生出来。通过中日两国启蒙和西欧启蒙思想的差异及共同性的比较，对我们进行东亚文明与西欧文明的比较，也可以提供一个极好的凭借。

第二，通过研究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和日本近代化的关系，即日本近代启蒙思想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兴起的？它又对日本近代化过程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明了日本近代启蒙思想与日本近代化的相互作用，进而由中日两国近代启蒙思想的比较研究，达到对两国近代化过程比较的目的。

我们以往的近代化研究，有两个重大缺陷。其一，是严重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即把西欧近代化的模式绝对化，认为近代化就是西方化，而忽视了各个国家的近代化与其各自的社会历史条件的联系。

近代化首先兴起于西欧，并且获得了成功。西欧大部分国家在这个过程中采用了资本主义制度，并且这些国家比其它国家在文化上、政治上、社会上具有压倒优势，这很容易使人们得出近代化就是西欧

化，就是资本主义化的结论。东方的日本，以西欧为模范，也走上了迅速实现近代化的道路。这也强化了人们把西欧近代化绝对化和对其盲信的观念。但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的对西欧近代文明和基督教文化怀疑思潮的高涨，加上对西欧文明无视其他社会条件而进行的强制之失败的反省，形成了把西欧文明相对化的精神土壤。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更促进了人们对近代化即是西欧化、即是资本主义化的反省。其结果，使人们得出了无论是西欧，还是东亚，或是非洲，近代化都和自己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可分割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是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彻底否定。

以往我们近代化研究的第二缺陷是，只注意了近代化的社会历史条件中的经济和政治方面，而忽视了其中的思想方面。与此相联系，也只注意到了经济和政治因素对近代化过程的作用，而忽视了思想因素对同一过程的影响。

受教条主义的机械唯物论影响。人们往往把经济对社会过程的作用夸大到极端，而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贬低了思想对社会过程的作用，因此，思想、文化与近代化的相互作用关系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片面决定论不能解释：为什么苏联和中国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条件下，却采用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日本在近代立宪政体问题上，于英国型、法国型和德国型之中，有意识地选择了德国型？为什么日本的近代企业能够把人们的传统忠诚心调

动起来，从而使近代科学技术发挥出极大效率？等等。这也说明传统的理论有着明显的不足。

总之，每个国家的近代化都是和自己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可分割的，近代化的社会历史条件不仅包括经济和政治，而且包括思想和文化。并且，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社会要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才使各个国家的近代化呈现了不同样态。因此，只有通过对一个国家的各种社会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全面研究，才能清楚解释这一国家的近代化过程；并且，只有对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项指标的综合平衡，才能对一个国家的近代化做出恰当的评价。

回到本文的主题，中国和日本在近代化开始以前，都具有高度的文化传统，同属于儒教文化圈，在迎接近代西方挑战时，都曾燃起过民族主义热情，但为什么日本那么迅速地由采用资本主义制度而实现了近代化，而中国却迟迟不能迈入近代化的征程，最后走上了与日本完全不同的道路？要解释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对两国近代化过程前后的政治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而精密的分析，而仅仅通过启蒙思想的比较是不可能完成这一课题的。但是，与上面的诸种因素相关联的启蒙思想的比较研究，仍是必要的。两国启蒙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又对两国近代化发生了什么影响？这样的工作对两国近代化比较无疑也会有所帮助的。

总之，本文的目的即在于，通过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研究，究明启蒙思想和日本文化、启蒙思想与日本近代化的关系，从而给中日

文化比较和中日近代化比较提供某种线索和可能。

但是，以往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研究，对我们实现上述目的，并未提供现成的方法和结论。在日本，虽然对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研究有如“汗牛充栋”，但是在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抽象评价的阶段。即或者只注意了启蒙思想与前近代的非连续性，从启蒙思想中抽象出近代性的东西，而给其高度评价；或者只强调启蒙思想与前近代的连续性，和与明治政府的某种一致性，从启蒙思想中抽象出非近代的东西，而给其过低评价。七〇年以后，以远山茂树《福泽谕吉》（一九七〇年刊）和广田昌希《福泽谕吉研究》（一九七六年刊）为代表，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研究，开始深入到启蒙思想与当时的历史状况、启蒙思想与日本的近代化、启蒙思想的前期与后期的联系、启蒙思想的逻辑等问题，并且富有成果。这些成果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很好的凭借，但是由于日本学者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与问题意识和我们不同，他们的研究几乎未涉及中日近代启蒙思想的比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日文化比较和中日近代化比较，因此，为实现我们的研究目的，必须另辟新路。

中国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研究，更是不能令人满意。资料的相对缺乏、语言的难关，都增加了研究的难度；起点低，中间又中断了十几年，更延缓了研究的进展；再加上研究方法的陈旧，也使中国对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研究迟迟不前。就目前总的状况而论，仍然停留于以某种先入为主的思想为标准，进行抽象评价的水平，而没有进入深

入具体研究的领域。

在上面的条件下，要实现自己研究的目的是有相当难度的，但我仍有信心向上面的课题挑战。虽然本文的研究不可能完满解决上面的课题，但如能“抛砖引玉”，引起人们对这一课题的关注和兴趣，以推进这方面的研究，也就不虚本文的写作了。

目 录

序论

第一章：“启蒙”概念的探讨。

一、什么是“启蒙”。

二、启蒙的类型。

三、中日两国近代启蒙思想的比较。

（一）中日两国近代启蒙的相似处及其原因。

（二）中日两国近代启蒙的相异处及其原因。

（三）几点启示。

第二章：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形成。

一、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历史准备。

二、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形成。

第三章：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内容。

一、功利主义的伦理思想。

二、“天赋人权”的政治思想。

第四章：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逻辑构造及其归宿。

一、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逻辑构造。

二、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归宿。

第一章 “启蒙”概念的探讨

一、什么是“启蒙”

人们一般谈到启蒙，都是把它当作自明的概念来使用的。但是，什么是启蒙，其内涵是什么？指的是哪些对象？这些恐怕是不太好回答的。然而，不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很难使人对我们的研究对象获得一个明确而清晰的感受，而且也不能使我们的研究继续深入下去。下面，试对这些问题做一番探讨。

启蒙，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诸如“启蒙导师”，“受到了启蒙”等等，都是指教育童蒙，使初学的人得到基本的，入门的知识，亦指通过宣传教育，使后进的人摆脱愚昧的迷信，由接受新事物而得到进步。如果在此意义上使用启蒙一词，则启蒙事实随处可见，启蒙概念也成为可以通用于古今中外并具有相当广泛意义的概念了。

但是，纳入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启蒙应有其确定的范围和内涵。那么，它到底指什么历史现象呢？

最经常出现于历史论著中，被人们当作思想启蒙的，是十八世纪西欧的特定历史地理条件下所产生的启蒙思潮，一般称为“十八世纪启蒙”。这个启蒙思潮，起源于十七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十八世纪初以来，经由法国，波及到德国，形成西欧的一场由先进国家到后进国家的壮阔的启蒙运动场面。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把中世纪看作是蒙昧黑暗的时代，而把自己的时代标榜为“光明的世纪”，“理性的世纪”。这里所谓的“启蒙”，即含有用“理性之光”去照亮中世

纪黑暗和蒙昧的意思。启蒙思想家们的目的，也是通过无情地批判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基督教神学，唤醒人们的理性和自我意识，给人们以新的思维方式，造就政治变革的物质力量，从而促进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给“十八世纪启蒙”以充分肯定和极高评价。他们指出，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①“培根、霍布斯和洛克是法国唯物主义者这个光辉的学派的前辈”；^②“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③“正象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④明确肯定了十七——十九世纪西欧资产阶级进步思潮的启蒙性质。

虽然“十八世纪启蒙”在英国、法国和德国情形有所差异，但它们的共同特征则是：用“理性”批判中世纪宗教蒙昧主义；用近代自由、平等的社会政治主张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用幸福主义批判宗教禁欲主义。“十八世纪启蒙”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成为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导，因此，其作为本文意义上的启蒙是毫无问题的。人们也大都在此意义上使用它，并以此为依据，把其他国家明确批判中世纪蒙昧主义和封建主义，宣扬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社会主张的思想称为启蒙思想，如“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但是，如果仅仅把“十八世纪启蒙”或与它相似的现象，当作历

史科学中的“启蒙”的话，便存在明显的片面性。首先，这种见解把“十八世纪启蒙”看作独立的社会现象，看作当时思想家们的杰作，或只承认启蒙思想与经济、政治的联系，而忽视了思想本身的历史准备，即只着眼于启蒙与中世纪的差别和非连续性，而忽视了“十八世纪启蒙”与中世纪后期所发生的早期思想启蒙的连续性和渊源关系。其次，这种见解忽视了后进国家启蒙的不彻底性，即忽视了这些国家启蒙的长期性问题。再次，这种见解是以西欧为标准来衡量非西方国家的启蒙问题，忽视了启蒙的民族与文化的差异，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

也有的同志，把西欧十四—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看作真正的启蒙。^⑤十四至十六世纪，在西欧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基础上，“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⑥这使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发生了文艺复兴的社会思潮，而德国则“由于时代精神的缘故，这个革命是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的，即表现为宗教改革”。^⑦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社会思潮的猛烈冲击下，“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了，德意志诸民族大部分都直截了当地抛弃了它，接受了新教，同时，在罗曼语诸民族那里，一种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明快的自由思想，愈来愈根深蒂固，为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⑧正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人文主

义思潮所具有的这种反中世纪宗教蒙昧主义的资产阶级启蒙性质，恩格斯才称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为“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⑨称文艺复兴时代为“现代自然科学和整个近代史”的开端的“伟大的时代”；^⑩也才把宗教改革看作“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⑪看作“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⑫

如上所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思想巨人们，虽然还未完全脱下宗教神学的外衣，但他们的思想实质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虽然还不能提出“十八世纪启蒙”所提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和社会主张，但他们提倡个性解放和信仰自由，反对教会的专制独裁，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市民阶级的要求，因而成为“十八世纪启蒙”的思想先驱。因此，人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社会思潮，看作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启蒙，并把如中国明末清初的反理学思潮、日本近世元禄时代的“学艺复兴”等纳入启蒙的范畴。

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类似的现象看作启蒙的观点，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第一，它发掘到了近代的真正起点，为把启蒙及近代思想的发展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过程提供了可能；第二，它提出并论证了中国有过自己的思想启蒙，即始于明末清初的反理学思潮，批判了那种把宋明理学看作中国近代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和否认中国有过自己的哲学启蒙的错误观点。但是，如果仅仅把启蒙定义为与资本主义萌芽相联系的思想表现，即仅仅局限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类的思想现象，仍然具有相当的片面性。首先，它否认诸如“十八世纪启蒙”

等属于启蒙的范畴，也就否认了这类现象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类现象在性质上的相似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它重视的是启蒙与资本主义萌芽的联系，而忽视了后进国在近代化过程中政治、经济、思想发展的不平衡，因此不能恰当地解释德、俄、中、日等国近代思想启蒙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政治经济状况的真实关系。再次，它同样忽视了一些后进国家在当代继续启蒙的课题，否认当代继续启蒙的必要性。

从以上对关于启蒙的两种观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观点，虽然都有自己的根据和理由，但也都有自己的片面性，特别是二者都没有提出或论证后进国家在当代继续启蒙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却越来越急迫地向我们逼来，催促我们对传统的启蒙概念进行思考和修正。

关于后进国家需要继续启蒙的问题，现在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里所说的后进国家，并不是指一般的落后国家，而是指在前近代已经具有了高度发达的封建经济和文化，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已经孕育出某些资本主义因素，因而具有潜在的近代性，但和近代化开始时的英法相比，还有一定距离。因此，这些国家的近代化不仅起点和英法不同，而且也不是一个自身发展的自然过程，而是在外部力量的作用下才开始的，也就是说，是在外界压力下被迫开始的。这样的历史特点，决定了这些国家首先把“富国强兵”当作第一急务，把主要力量放在经济和军事上，而相对地忽视了思想启蒙或思想近代化的任务。近代化起步晚加上近代化过程中经济与政治、思想发展的不平衡，**

造就了这些国家近代思想启蒙的不彻底性。而把仍然十分沉重的启蒙任务留给了后人乃至当代。例如，日本是东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唯一迅速实现经济和军事近代化的国家，并且也经过了近代思想启蒙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等多次思想解放运动，但最后仍走向了军国主义、法西斯的道路。德国也是西方后进国家迅速实现近代化的一例，但是也在资产阶级近代启蒙之后，甚至在马克思主义兴起并普及之后，仍然陷入法西斯主义的泥坑。中国的情况不同于德国，也不同于日本。它在实现近代化的过程中屡受挫折，步履维艰，最后终于由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但是，我们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可以知道，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作为资产阶级对立物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批判资本主义的面目出现的，它以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对手，并且在和资产阶级斗争时往往与农民结成同盟军，因而忽视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这也使近代启蒙工作没有很好地完成，封建主义的沉渣不时泛起，封建意识的毒素仍浓厚地保留于人们的肌体中，文化大革命的出现就是一例。这使思想启蒙的任务遗留至今。因此，不承认后进国家存在继续启蒙的问题，不仅无法解释上面的事实，也不能解释类似日本战后民主主义高潮和我国文革后出现的启蒙思潮。

提出后进国家继续启蒙的问题，是为了使人们对这些国家的封建残余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的传统封建意识，今天仍严重阻碍中国的民主化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仍在一部分人身上

不散。等等。这些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只有更多的人起来进行启蒙的思想工作，才能由改变人们的意识而改变现状，从而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总之，历史科学中的启蒙概念，不仅应该包括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那样的早期资产阶级社会思潮，也应该包括类似“十八世纪启蒙”那样的近代启蒙现象，还应该包括后进国家当代所进行的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给启蒙定义如下：启蒙，就是具有高度文化传统的国家，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种社会思想现象。它的目的在于通过批判中世纪蒙昧主义，批判封建主义，宣扬近代社会政治主张，实现人们观念的变革，促进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制度的确立。

以上，就是我对“启蒙”这一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如果把人们日常所用的启蒙概念作为广义的话，那末，历史科学中所用的“启蒙”范畴就是狭义的了。

顺便提一下，本文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日本启蒙思想史，而是已成为通说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只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才提及日本早期启蒙及近代启蒙之后的历次启蒙，故如果前面不加限定词的话，“启蒙”概念即指“日本近代思想启蒙”。